



名家名笔

良知与懿行

云 德

现实意义。

首先,倡导良知与懿行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客观需要。社会作为不同个人和族群组成的命运共同体,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是全社会每个成员共同的职责与义务。公民普遍化的良知与懿行,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基石。尽管社会治理主要手段来自法律,但伦理道德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完美实施,永远都离不开高素质人群的集体参与。这里所说的群体性参与,有时是共同行动,像人民代表大会、乡规民约、公决投票、集体活动等,更多时候还是独立的个体化行为。公民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言行举止,最后都会转化为社会状态的积淀物,并对社会秩序的演进起到特定的推动或阻滞作用。作用的大小,或在波谲云诡的和平年代不太明显,但在社会动荡的岁月里,某些善念和行为包括那些素常不被留意的言行,可能影响一群人、影响历史走向,甚至对某些受益者影响终身。

18世纪中叶英俄战争期间,有个叫南丁格尔的女护士,每天在前线替伤员清洗包扎、换药喂饭、洗涤带血的衣物,晚上提一盏气灯在长达4公里的巡诊线上,挨个查看病情,给伤员送去安抚和爱心,每天工作超过20小时,累得满头青丝几乎掉光。由于她的尽心尽职,伤员的死亡率从60%降为0.3%,从此改变了人们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与认知。战后,她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并为之塑起“提灯女郎”的巨型铜雕,联合国以她的名字设立“南丁格尔国际护士奖”,将其奉献精神推向世界。再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宜昌沦陷前夕,不计个人得失,指挥他的民生公司,经过40天的日夜奋战,把聚集宜昌的职员、学生和各界流亡人士150万人和100余万吨战略物资运抵四川,其间公司有85艘船只被日寇炸沉或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这个被誉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为保存当时的国家政体、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上述事例,无论面向的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均系出于公心、道义和良知的选择,而非一己的贪欲和私利,他们的懿行善举不论大小,都在一定范围内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圈”效应,进而向全社会辐射出浓郁的爱国、正义、仁爱和利他的积极能量。

其次,倡导良知与懿行是涵养公民素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礼教。文人士大夫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普通

百姓讲究做事先做人,现代社会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一脉相承地把修身养性作为国人的立世之本。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记》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把修身作为做人的第一要务。在儒学经典看来,修身的核心要义在于“内圣外王”,而实现内圣的主要途径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强调要以慎独慎微的敬畏之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吾日三省吾身”,以求不断提升并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尽管“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的修身行为属于私德范畴,但每个社会成员优良私德的有效培育和实施推广,就是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建立的无限希望。

关于私德,杨震的事迹影响巨大。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吏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早年的旧部王密在昌邑做县令,为报答恩公当初的提携之情,趁夜晚谒见之机送去十斤白银。“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罢,愧疚离去。杨震言行一致,一生为官清廉、事业有成,老来过着平民百姓般的简朴生活,有老友看不过去,劝他也为子置置些产业,杨震不肯,自豪地回答:‘如若后人视他们为清官子孙,我留给后世的这份遗产,不是也十分丰厚吗?当然,像杨震、包拯、海瑞这样载入史册的清廉人物并不太多,因为私德属于个人隐秘的修为,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所以知名人物的道德风范才成为后世争相效法的楷模。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秉持良知与美德之人并不少见,不然,中华民族不可能维系五千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就是一个普通人高尚的精神境界!正所谓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充分表明,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和善意的自觉,才是做人凭良心、干事守本分、处世循规则的基本前提,尽管普通人的所思、所虑、所行可能经常籍籍无名,湮没于岁月的长河之中,但他们所传递出的文明正义的曙光,却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助推着社会佳风良俗的形成。

再者,倡导良知与懿行是固守公共伦理的最后防线。人要融入社会就必须遵循人类基本的伦理纲常,不能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肆意妄为。如果没有良心的自我约束,脸厚似城墙、心黑如煤炭的厚黑哲学就会大行其道。人性沦丧的结果,良知必然泯灭,行为也就失去了道德底线,社会势必走向混乱。章炳麟认为:“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言辞固然尖锐,但其理不虚。因此,有必要让良知成为人类的第三只眼睛,诚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言:良知是每

个人心头的岗哨,它时刻为人值勤、站岗、把关,监视着我们不要做出失德违法的事情来。若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秉持敬畏、戒惧之心,坚守道德底线,各种违规失范的不良行为自然日益减少,公然挑战人伦纲常的丑恶事件就会销声匿迹。

良知既是防范失德的卫士,也是纠正行为失范与偏差的制动器和矫正仪。人非圣贤,岂能无过。不是说秉持良知,心存敬畏,就有了天生的道德免疫力,就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即便做了错事,只要不昧天良,就会用自我反省意识重新审视是非曲直,做出合乎人性和社会公理的正确选择。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走出“牛棚”之后,有感于自身境遇,设身处地地联想到其他受伤害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反思自己在以往政治运动中的不当言行,情真意切,发人深省。薄薄的几册《随想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坦荡心胸和高尚情怀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那些参与整人却不思悔过者无地自容。还有,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卢梭,小时候为求生计,受雇进伯爵家当佣人。有次鬼使神差偷拿了别人一条漂亮丝带后被告发,害怕被雇主辞退,推说是厨娘所偷,导致二人同时被辞,这件事给卢梭造成终生痛苦。40年后,他专门写了本《忏悔录》坦陈此事,说:“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经常在残酷的回忆中彻夜难眠,“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所以他采用向社会公开坦白的方式表达对厨娘深深地忏悔。

所以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古语有言:“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在做、天在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任何昧着良心的坏事,任何暗室欺心和瞒天过海的陋行,有时可以瞒过世人的耳目,却逃不过天理的法眼,逃不过自己良心的谴责。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良心煎熬更加痛苦的审判了。同样道理,生命没有高低贵贱,懿行善举不论明暗大小,只要你心怀善念、真情付出,行小善便是积大德,良心安宁就是最大的福报。因而,我们真诚呼吁每个公民都能正心诚意、坚守良知、守望公德,多一些、再多一些良知引导下的懿行善举,坚决遏制见好处就上、见问题就躲、见困难就让的不良风习,遏制恃强凌弱、狐假虎威、恣意妄行、毫无悲悯之心的庸庸之恶,遏制各种坑蒙拐骗、见利忘义、贪赃枉法的丑陋行径,祛除形形色色的“道德寒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捐细流、不拒细壤,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风清气正、温馨和谐、道德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委员笔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让文艺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田沁鑫

80载峥嵘岁月,80年风雨兼程。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推出大型文化节目《从延安出发》,赓续红色血脉,凝聚文艺力量。节目集结16家国家级文艺院团、院校及演出机构,以殿堂级文艺表演串联起8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脉络,向时代汇报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成就。中国国家话剧院十分有幸参与其中。

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于延安。历史赋予了我们丰厚的底蕴,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国家话剧院的前身,是1941年9月创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由中央青委和中央文委共同领导,塞克为院长,王真、吴雪为副院长,聘请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万籟天、夏衍、曹禺、阳翰笙为剧院名誉理事。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戏剧在抗日战争的文化战线上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传作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提到延安的红军剧社,“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的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延安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根,是我们始终不会忘怀的荣光。

进入新时代,国家话剧院牢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责任和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在不断推进戏剧创作的同时,探索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互融互通。其中,总台无疑给戏剧搭建了一个能够施展多样艺术形式和广泛传播的优质平台。

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中,团队利用多场景变换和舞美设计等创新,让“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式有了物质基础,用不负时代的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典籍里的中国》创新设计270度立体舞台,营造出双舞台、时空长廊等多空间沉浸式的讲述场,以古今读书人穿越式的对话,全新串联了书中的故事,将纵横穿越数千年的精彩,浓缩到生动的舞台上。

《故事里的中国》用“1+N”多舞台空间,进行多线并行的立体叙事,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沉浸式体验。这样的跨界合作不仅掀起了现象级的文化热潮,还让戏剧艺术通过电视媒介走向千家万户。

在此次参与《从延安出发》节目的合作中,中国国家话剧院为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承担了部分舞台戏剧编排演工作,用戏剧的形式展现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初心。

如何将先辈的故事生动再现,用十几分钟浓缩那些经典的人物和故事,是一个难点课题。制作前期,节目导演组和戏剧组做实功夫,阅读大量史料、走访相关领域专家,通过戏剧与影视化拍摄相结合的手段,力求展现生动真实的延安时期文艺创作者形象。在戏剧创作中,更要立足当下,在追求品质的同时,也要讲好先辈们的韶华故事。

《从延安出发》“以青春碰撞延安”,是节目的一大亮点。节目组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与前辈文艺大家的对话中,展现中国几代文艺青年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这无不是一次追寻青春之旅。

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年代,青春的热血都与时代主题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洗星海先生曾说,“希望自己的创作,能从人民中生长出来,用音乐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句话着实让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感动。

正是因为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他的作品才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份从人民中生长出来的、赤诚的创作之心,在当代依旧闪闪发光,催人奋进。而这,也是《从延安出发》的核心表达。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思考,在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进程中,文艺应当如何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焕发新风貌,发挥应有的引导力和凝聚力?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我们创作的剧目《直播开国大典》有幸在节目中呈现了部分选段。在1949年的北平,有一群可爱可敬的广播人员队伍,不舍昼夜,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直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向全世界发出新中国的“成立之声”。

剧中,在转播任务完成后的表彰会上,宣布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定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支从延安走来的解放军广播队伍,将脱下军装走向人民。技术人员卢海宇眼含热泪地说,虽然不舍得这身军装,但是“多为人民做事、回到人民中去,这就是党给我们的最新任务和使命,我们是人民的广播电台,要为人民发出声音”。

“为人民发出声音”,也道出了国内所有文艺院团、院校以及全国文艺工作者,在当代进行文艺创作的初心和使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总台携手国家话剧院等16家“文艺国家队”。用《从延安出发》回首80年前那不灭的灯塔,用匠心和真心讲好中国文艺故事,展现出主流媒体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文艺工作不仅关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关系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也将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委员笔记



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社会在狂飙突进的同时,各种污泥浊水也难免沉渣泛起;大家在交口称赞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不断感慨安全感和信任度的隐忧降低。面对公共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以及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见利忘义之风屡禁不止的现状,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良知懿行的企盼显得愈益迫切。

良知作为人类所秉持的某些合乎公德的人生态度,是内心世界关于行止善恶美丑的价值取舍。

在儒学的经典论述中,良知是一种顺应天道而赋予的智慧。《孟子》强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也,良知也。”发展到王阳明那里,良知成为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心理学理论体系可用六个字、四句话集中概括为:“心即理,致良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从中足见良知的重要。应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意在强化人的心智锤炼,追求做人知行合一的根本目标,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一脉相承,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他延续了孟子关于良知来自先天、是不学而得的良好判断力的观点,本质上忽略了后天的养成和环境的再造,良知也是唯心的、偏颇的。殊不知,人之初、性本善固然美好,但在后天修为社会浸淫的作用下,人性是完全可以变恶的。所以说,良知虽有天赋因素,更有后天养成之力。有没有良知,能不能坚守良知,从本质上是由人的认知、志趣、品德以及全部生活方式所共同决定的。而懿行则是良知主导下的合乎人性与公理的表现。因此,倡导与涵育人民大众的良知与懿行,对于扭转不良风气、推动文明社会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

谈文论艺

诗歌鉴赏

从师记

缓之

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能遇上好老师,往往会影响到他的一生。我心目中的老师大体有三种:一是直接授业的老师,二是间接师承的老师,三是衷心私淑的老师。在《从师记》的结尾,我写道:“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的求学道路上,老师们对我的影响既广且深。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过去几年,我写了若干纪念前辈业绩的文章,评述了范文澜、梅兰芳、潘天寿、郑振铎、姜亮夫、钱锺书、逯钦立、孙犁、柳青、曹道衡、樊骏、沈玉成、邓绍基等人的贡献。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这些文章,多已收录到我的论文集《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重可能性》以及《致予望之》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

过去一年,疫情肆虐,我因居家中,有更多的时间整理资料,于是又撰写了若干新篇。《传记文学》编辑胡仰曦女士鼓励我开辟专栏,畅所欲言,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积极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学先生看过我为俞宁教授《我爱吾师》所写的序言,深表赞赏,盛情邀约编辑此书。对于他们的高情雅意,我心存感激。在书籍编辑过程中,我又选择几篇不曾在上述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也有敝帚自珍之意。《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而作,2008年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已收在《致予望之》中。此后,我对文章作了较大的修订充实,实为重写,很有时代色彩,故不揣陋陋,收录本集中。这是唯一重收的文章,请读者谅解。

上编六篇以我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说到下乡生活,求学经历、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以及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下编九篇则是对前辈学者的追忆和纪念。

本书原名“闻斯行之”,想与我另外一本随笔集《致予望之》相呼应,表达对学术的仰望之情、对前辈的追随之意。“闻斯行之”语出《论语·先进》。孔子希望恭谦的弟子做事再大胆一点,听到就做,不要犹豫。我为人处世向来胆怯,时常退让,但求学问道,却很主动,颇近于“闻斯行之”的风格,故取作书名,给自己壮胆。交稿后,编辑建议我选择一个更通俗的书名,便于传播,这也不无道理。于是我便想到“从师记”三个字,简洁明快,既是书中的一篇,也与全书弥漫的情思一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神州! 神女!

——写给中国第一位女宇航员刘洋

丘树宏

怀一种使命义薄云天,
放一股英气激荡叱咤。
虽然早已练就补天的天大本事,
你也不是那个你同样崇拜的女娲。
你将关于女性的传说化理想,
在广袤的宇宙描绘出一幅伟大的图画。
你再好的桂花酒也总是广寒宫,
寂寞的乡思只能压在深深的心底下。
而你,一开始就可以在天地间来回穿梭遨游,
你让古老的神话迈出了走向现实的步伐。
有人说你是翩翩飞舞的飞天,
长袖凌云姿容娇媚还反琵琶琶。

其实她们只不过是敦煌远古的梦想,
深锁在莫高窟空等千年的幻化,
而你,一身的橄榄绿那样的威武飒爽,
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无意粉黛铅华。
庄严的太空衣载满了人类的重托,
轻盈的太空漫步让多少人陶醉怒放心花。
你说你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女神——
不是那个传说那个美丽神话。
然而,当2012年6月16日的到来,
你就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平常的她。
神州神女的美名啊,
从此响彻云霄、传遍天下……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夏荷

贾宁 摄